

书院藏书:古代藏书楼中的务实派(上) ◆ 赵美婷

书院是指我国古代唐宋至明清时期由私人创办或主持的聚徒讲授和研究学问的场所,是一种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据考证,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是历史上私人创建的最早的书院;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这些书院开始多半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到后来,书院才逐渐成为培养人才的教学机构。作为一种与官学有所不同的学校,它是官学教育制度的有力补充,它是士人聚书读书、讲学授徒的场所,自学为主、讲授为辅是其教学特色。藏书是书院教育制度必不可少的。藏书、供祭和讲学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

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有学者把书院藏书归入公藏,以区别于私家藏书楼的私藏和官府藏书楼的官藏。一些著名的书院还从事图书刻印活动,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伴随书院兴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的兴盛期,书院藏书得到了飞速发展。宋代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的藏书之丰富自不必说,即使是普通书院,藏书也不少,有的甚至超过国家藏书。北宋皇帝频频赐史典籍给岳麓、白鹿洞、嵩阳诸书院,因而成了政府倡导之势。南宋年间,在朱熹、魏了翁等一大批书院建设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书院与各学派结合而成的学术需求,终于使书院



岳麓书院

挟其林立各地的藏书楼阁、皇皇数万乃至十万卷院藏之数,成就其藏书之业。从此以后,书院藏书就自立门户,得以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一起,并称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元代的书院藏书在宋代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迈了一步。以藏书规模而言,成都草堂书院石室贮藏了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刻本、手抄本、拓本、手稿本书达27万卷之多,远远超过宋代鹤山书院10万卷之数。可见其时书院藏书事业之盛。此外,书院的藏书建设至元代也已进入了正规化、制度化阶段,已设置专人管理书院的藏书,并形成图书借阅制度。其后,直至明清,历经数百年发展,书院藏书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总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包括图书征集、编目、保管、借阅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明代是我国书院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但其时,书院藏书的规模并不大,前不及宋、元,后不敌清代。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王阳明、湛若水心

学思潮的影响。这一代的书院建设者以发挥心学为己任,他们钟情于书院的讲学、会讲,重悟性而轻积累,对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不甚重视。到后来,王湛之学滑入末流,空谈吾心、束书不读竟成时尚,书院藏书建设更加受到冲击,书院藏书最终失去了在明代形成盛势的机会。

到了清代,其前期的书院藏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注重理学著作的收藏。中晚期以后,则开始受到西方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影响,并在书院的教学及藏书等方面反映出来,藏书由传统的经史百家之书变为传统典籍与反映洋务、新学、时务、西学的书本并存,藏书的形式除以线装等传统技法装订的书籍之外,还有以金属类订书针装订的所谓“洋装”书籍,开放范围也逐步扩大。

书院建筑一般多有讲堂、祭殿、藏书楼、斋舍与其他生活设施等,规模较大的书院大多建有藏书楼阁,拥有丰富的藏书。如宋代书院著名的藏书楼就有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

御书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书院崇文阁、白鹿洞书院云章阁、扎溪书院明经阁、龙山书院六经楼等。至清代,书院藏书受到普遍重视,凡建书院,即谋藏书,因此,各地书院都创建了名目繁多的藏书处所,收藏经史百家之书,以为师生研习讲诵之资。藏书楼也成为书院的主要特色建筑,在书院建筑布局中,藏书楼是书院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建筑,甚至可能是整个书院建筑群中唯一较高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书院的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藏书楼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从哪里来

书院藏书属书院所有,对书院内的师生开放,因其公共性和开放性,故既有别于官府藏书楼,又不同于私家藏书楼。

书院藏书有5个主要来源:一是历代皇帝赐书,其数虽少,但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二是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府置备,它动用政府财力,虽难得多见,但一举即可解决问题,因而成为一些书院主要或唯一的藏书来源;三是社会捐助,包括官绅士民个人捐赠、院中师生捐置、非官方公众机构赠送等3种形式,它是书院藏书最主要的来源,是书院藏书事业最根本的保证;四是书院自置,包括斥资购书、书院自刻图书两种形式;五是设立图书基金,即利用官民二途所得银钱或田产,设为购书专款,利用息金或田租收入,常年为藏书楼提供图书。

书院藏书为教学而置,故所藏多儒家经史、名家诗文和时务实学

之书,近代则兼备西学。书院藏书的特点是重在使用,不在于收藏,不在于消遣,不在于标榜风雅。选好书,选有用的书,选学术价值高的书,选育人成材的书,是书院藏书的宗旨。所以,书院藏书绝无俚俗游娱读物,也不追求版本的古旧珍稀。也因此,书院藏书虽多,却鲜有传世留因者。

书院藏书的出现还与雕版印刷的发明和推广分不开,印刷术的发明为民间、私家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而藏书的增多,尤其是民间、私家藏书的增多,为士人创造了接触更多图书的条件,从而促进了求学方式的迅速转变,使“训诂句读,皆由口授”的状况变为“可视而诵”。

书院藏书有的时候也是对官府藏书的一种补充,特别是动乱时期,往往是官府藏书散失而书院和私家藏书兴盛之时。如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动乱时期,却使书院和私家藏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时,国子监徒存其名,郡国邑县之学亦几尽废,书院则肩负了收藏典籍、保存文化的使命。一些大家族、大贵族往往以学馆的形式聚书,招延文士。再如明清时期,由于民间士绅对书院教育的极度热忱和向往,他们普遍将资助、创办书院看成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官方也倾注力量对书院的发展加以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的,因此,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其在传播文化、发展教育、培养士绅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藏书楼的建设。在学术和教育发展的同时,书院藏书和藏书楼也得以发展,藏书楼规模的扩大,典籍的增多,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学术和教育的繁荣。

(明日请看 B5 版)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第三章 战功(连载 23)

郭林祥上将:彻底平息黑水叛乱

1952年6月13日,美蒋特务向四川黑水空投得逞。国军一〇四师师长傅秉勋与黑水大头人苏永和纠集万余人发动叛乱,建立“黑水反共反攻基地”。同年6月上旬,西南军区急调十一个步兵团等两万万余武装部队进剿黑水。7月20日发起总攻,兵分东、西两路,直捣黑水叛匪中枢指挥部麻窝。24日下午,两路大军于麻窝胜利会师。9月16日,苏永和归顺。9月26日,傅秉勋毙命。是时,黑水叛乱彻底平息,一千兵匪或被击毙、或被活捉、或冻死摔死、或畏罪自杀、或提械投降,无一漏网。黑水战役前方部队总指挥,郭林祥将军是也。

1952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贺龙元帅将《关于傅匪毙亡情况报告》呈周恩来,周阅后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之大喜,曰:“黑水战役,取得军政双胜!”郭林祥将军言,将军由前线返回重庆时,贺龙元帅眉飞色舞告知此事。

张爱萍上将:指挥陆海空三军解放一江山岛

1955年1月18日,华东军区发起解放一江山岛战斗。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指挥此役,初战失利。是时,肖望东将军随许世友到前线视察,许摩拳擦掌曰:“我去指挥打,就不信拿不下这个小岛。”将军急劝阻:“再等等看。”许应允。不数日,张爱萍将军果克一江山岛。

王诤中将:我军无线电事业之始
我军无线电事业自王诤将军始。红军初期,通信主要靠交通队,骑马或步行传递信息。1930年底,红军攻克辉瓃部,缴获一批报机、收报机、充电机、蓄电池等。但不识这等铁匣子为何物,均“乒乒乓乓”砸个稀烂。朱德、毛泽东闻之,发布命令:“今后凡缴获的一切不认识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后,王诤参加红军,将损坏之电台修好,



组建无线电队,红军无线电通信由此始。杜平将军时任红三军无线电队政委。

杜平中将:只字无差报长征

红军长征中,杜平将军任红一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兼直属队党总支副书记。将军回忆,无线电队下辖报房、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共百余人。电台等装备笨重无比,收报机、发报机20余公斤,蓄电池30公斤,共6个,充电机45公斤,汽油10瓶、20瓶不等,及机器零件箱等,均由人力运输。将军有诗记其事,曰:“电波英雄红心通,宵达且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

王必成中将:率部抗日,被江南人民誉称“老虎团”

1938年王必成将军由延安赴东南抗日前线,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继任团长。将军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之敌,连战连捷,敌伪闻风丧胆,受到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电表扬。江南人民誉称二团为“老虎团”,王将军为“王老虎”。

黄新廷中将:首创我军一个团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之战绩

1938年11月,黄新廷将军率部设伏五台滑石片,果断指挥三营拦头,二营打腰,一营堵尾,与日军断野大队激战一夜,大捷。是役歼灭日军全部700余人,俘虏21人;缴获战马135匹、山炮2门、小炮4门、轻重机枪30挺、步枪340支、子弹1万余发。首创我军一个团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之战绩,遂留下我军将士穿日军军装和缴获武器的珍贵照片。其时,黄新廷将军任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该团代号为“亚六团”。

胡奇才中将:“打死鬼子三十三,活捉一个翻译官”

迟浩田任济南军区政委时,曾三上沂蒙山。1986年夏,迟政委至临朐途中,见一渔翁垂钓沂水,年逾花甲,鹤发童颜。时杨柳依依,山色青青,如入仙境。迟政委下车拜见。渔翁闻迟当年曾作战于此,抚须问曰:“可知当年有个胡司令?”迟答:“是否胡奇才将军?”渔翁大喜,嘴衔烟斗,手舞足蹈,唱曰:“胡奇才,真勇敢,指挥八路打治源,打死鬼子三十三,活捉一个翻译官。”1987年,迟浩田赴京开会,特将此抗日民谣书赠胡奇才将军。

26.老刘的剃头摊

剃头师傅的旧皮包挂在电线杆上,里面是他的剃头家什,像一块醒目的招牌在弹路路的弄堂中张扬。

小孩都有不肯剃头的习惯,据我的心理学家朋友研究说是因为小孩子多动,一到了剃头师傅的剃刀之下,要有好几分钟的时间无法动弹,很不舒服。还有的小孩看到剃头师傅拿出来明晃晃的剃刀,会不知所以地害怕起来,甚至于习惯性地恐惧。后来蒋家巷有的妈妈吓唬孩子,也常常会说:“你再哭,我就送你到老刘那里去。”搞得小孩更加害怕剃头了。

我也不喜欢剃头,等到头发老长了,都是妈妈叫着:“到老刘那里去剃头。”有的时候不肯去,被妈妈拉着逼着陪送到老刘那里。

一到老刘那里,任何小孩,从新生儿开始,不管多害怕剃头的小孩,都会被老刘乖乖地制服。他对付小孩确实有一套,再调皮捣蛋的小孩,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着多动症的小孩,到了他那里,都服服帖帖。老刘一脸灿烂的笑容首先就影响你的情绪,他和颜悦色、慈眉善目地为你围好围脖,轻手轻脚地工作。他特别会逗小孩,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边讲笑话,分散小孩的注意力,一边在小孩子杀猪般的叫声中剃好了头,而且是保质保量。剃完之后,顺便用他不太换水的脸盆为你洗头,最后还要在小孩的头上嘟嘟囔囔几下,一边念叨着:新剃头,打三记,不打工三记触霉头。嘟嘟囔。最后,小孩和妈妈都满意地离开。妈妈们临走之前都不会忘记笑眯眯地拿出一毛钱给老刘。

我大概从很小的时候就是老刘的客人了。很有可能是从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就在老刘那儿剃头,我问过我妈妈,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到老刘那里剃头的,妈妈说你一养出来就在老刘那里剃头了,是个老客人。我后来从幼儿园到小学,经过蒋家巷老刘的剃头摊,都要跟他打打招呼,好像是老朋友一样,老刘永远是笑呵呵的。这种关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那是1966年的夏天,突然有一天,蒋家巷里纷纷传着一个重大的消息,老刘要游街了。听解他游街的那帮人的口音,好像不是

上海人,是来自北方的。旁边的大人一问,原来这是老刘原籍的河南家乡的人找到上海,其中一个说:“他是一个逃亡地主,在我们家乡有好几十亩地,解放初就逃到上海,是个漏网的地主,是四类分子。现在我们要把他押送回去。先要在你们这里游街,消毒。”

我的心中只有疑惑和恐惧。为什么一个整天笑呵呵、为每个人殷勤服务的剃头师傅,竟然一下子成为阶级敌人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门前有了一个皮匠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海人叫皮匠总要加个小字,小皮匠,但是碰到饭馆的厨师就叫大师傅。大概皮匠总是闷声不响地蹲在一边干活,不太惹人注意,做的活计又不太重要,是帮人修补皮鞋布鞋之类的小零碎的事情。而菜馆里的大师傅不一样,是管你吃的事情,民以食为天。

我们家门口的小皮匠实际上就是住在我们楼上的一个邻居。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有了杨树浦自来水工厂,供应上海的自来水。但是这座城市房子里没有自来水的地方很多,我们住在这个沪西偏远的地方,房子里就没有自来水。于是建房之初,建筑商就在地上挖口井,用一架高压水泵,把水抽到三层楼顶上最高的一个水箱里,然后通过水管子,将水箱里的水输送到六家人家的自来水管子里。而这座水箱,恰巧就建造在我家晒台的顶楼上。后来在打井的旁边搭了一座棚子,给管理水箱的工人仇师傅住。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用上了自来水,这个正方形的水箱就废弃不用,空关在屋顶上。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曾经很顽皮,这个带有一点神秘的水箱就成为我们小孩玩耍的天堂。我跟着我们楼上的邻居,叫我六七岁的毛毛爬到屋顶上去玩,专门顺着铁梯子攀到晒台上,从晒台狭小的木梯子再爬到这个水箱旁边,从旁边水落管子翻上水箱。这个过程充满了刺激。我们站在水箱上往下看,人变得很高很高。

这个四方大约八九个平方米的水泥顶上,只有一个小圆窗,是给仇师傅用来观察水箱里的水质和水位的。

消失的蒋家巷

吴琦辛

